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4.002

新内源性发展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特色 农业发展模式及机理

——以凉山喜德县为例

薛敏, 蒲海莲, 杨绘兰

摘要: 推动优势特色农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而探索高效适宜的发展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 以喜德县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为案例样本,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受资源整合、多元参与和发展认同三要素影响, 三要素交互作用下形成了集体动员型、内部合作型与内外结对型三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本研究为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范式, 弥补了现有研究将新内源性影响要素作为静态研究的不足, 同时能够对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 新内源性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 特色农业;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4-0011-12

收稿日期: 2024-04-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户生产联结(PPL)机制及其关联性信用风险演化机理研究”(项目编号: 71873101)。

作者简介: 薛敏(1981—), 女, 四川成都人,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组织战略创新、农业经济管理, E-mail: 13128591@qq.com; 蒲海莲(2000—), 女, 四川南充人,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 杨绘兰(1997—), 女, 四川宜宾人,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 农业行政管理。

一、引言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指出“各地加快农业转型升级需依靠地区资源禀赋, 有序开发优势特色资源, 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指示要立足国情农情, 体现

中国特色,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因此,依靠地区特色增强优势特色农业内在发展动力成为各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然而少数民族地区集边缘性、宗教性、贫困性为一体^[1],有着资源稀缺与价值增值的深层矛盾^[2],产业主体参与不够^[3]、优势资源开发不足^[4]、产业结构趋同^[5]等现实桎梏制约优势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在立足中国资源走好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上精研细思,在实现路径、对策建议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效,如黎杰松等^[6]认为民族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途径在于激发内生动力、加大资源投入以及完善制度治理;王丰^[7]提出从资源、参与主体、两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制度等因素综合考虑,从整体层面构建特色发展模式可实现特色农业的“第二次飞跃”。由此可见,资源共享、参与治理、身份认同能够成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桎梏的有效路径。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内生发展不仅需要广泛资源投入和多元主体参与^[8],还需要探索因地制宜的产业模式构建地区经济发展韧性^[9]。现有研究指出多元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对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起决定性作用^[10],从外部帮扶到内生驱动过程中,不仅需要持续强化参与主体的发展认同、民族认同^[11],更要将当地优势农业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致富优势,使特色农业承担起农民的生计功能,让多元参与主体在资源的高效利用中获得经济实惠^[12]。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离不开资源、参与、认同等要素的综合作用,而新内源性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按照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的原则,选取大凉山高端有机特色农业示范区——“彝族老家”喜德县内三家特色农业示范性企业,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通过资源整合、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发展认同三要素互动,在充分尊重地区民众需求和意愿的基础上激发多方主体的参与热情^[13],引导外部要素流入地区内部系统,撬动内外部资源向产业聚集,构建可持续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二、理论回顾

(一) 特色农业

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指出:特色农业是指依托和发挥地区地理位置、资源条件、气候环境、市场因素、信息技术等优势,开发特色经济作物和特有生物资源,培育和构建有自身特色的、独特的农业产业。有别于常规农业,特色农业能更充分利用区域内优质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经济优势和强有力的竞争优势,通过高品质、高价值、高竞争力的农产品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从而促进农户增收和农业经济发展^[14-16]。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乡村振兴、数字化、农业现代化等视角出发对特色农业发展展开研究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刘博敏等^[17]研究发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之一;陈银娥等^[18]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发挥在产品交易和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促进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李静等^[19]认为农业公司是实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微观主体,是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衔接纽带,农业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虽然也有研究关注到了新时代民族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2],但关于特色农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影响要素及其发展模式、内在机理等方面鲜少涉及。

(二) 新内源性发展理论

新内源性发展(New-endogenous)也称“新内生式发展”,是基于传统内源性发展理论而提出的区域

社会可持续战略理论。新内源性发展被定义为地区在发展进程中不断从外部获取有利于维护本地文化观和世界观的知识和资源,并利用内生潜力、发展社会资本和促进地方参与作为三大支柱,将内部系统和外部网络相融合,进而激发当地的发展潜力^[20]。相较于传统内源性发展理论,新内源性发展在捍卫其价值立场基础上承认并接纳超地方因素(如中央政府、帮扶单位等外部力量)与地区内生力量的联动与融合^[21-22],体现出“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的互动理念^[22-23]。理论的核心要素——资源、参与、认同在我国学界得到普遍认可^[24],不少学者积极运用该理论视角探索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江剑平等^[25]提出以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为核心的乡村振兴逻辑在于有效组织农民参与、优化各类资源配置及全民惠及发展成果;闰彩霞认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路径需重建乡村共同体,并大力发展自然与人文的互嵌与交融的乡村优势特色产业^[26]。现有文献对后续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路径的探讨提供了有益指导,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到新内源性发展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中来,徐虹、张行发通过对贵州卡拉村寨乡村旅游的案例分析,发现本地资源利用、居民参与、地方认同等新内源性发展要素与当地乡村旅游行业发展之路高度契合与适配^[27]。事实上,在新时代背景下,常规农业发展模式失灵,而新内源性发展的三要素——资源、参与、认同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更具产业优势的特色农业。

已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所需的诸多力量与资源并不仅来源于地区内部系统^[28],政府与市场作为超地方理论弥补地区内源力量的不足^[29],超地方力量的注入能够带来内部系统缺乏的知识、技术、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等诸多资源,在经济与社会的协同互促中推进产业发展进程。获得参与主体共识是民族地区特色农业能否实现内源性发展的轴承所在,而解决好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地区内部主体的积极参与^[30-31]。从能力差异视角上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不仅可以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还能将自身力量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32-33],且充分发挥地方居民主体作用还可以有效减少产业发展道路上人为阻碍因素,进而实现减贫致富^[34]。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决定着参与主体发展意识的转变,为参与主体对特色农业的发展认同提供了心理纽带并整合其精神动力^[35]。由此可见,新内源性发展理论为解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及内在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本研究采用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揭示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需要探索资源整合、多元参与、发展认同三要素如何互动促进不同发展模式形成的问题,该研究问题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辩证性,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能够清晰呈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的动态性与整体性^[36]。第二,本研究问题属于“如何”(how)型问题,涉及资源整合、多元参与和发展认同多个分析层面,通过多案例方法可以更深入、细致地展示案例,充分挖掘出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的不同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37]。第三,相较于单案例研究方法而言,多案例研究方法能够通过“复制”逻辑,对比和识别不同发展模式形成过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帮助构建类似准实验逻辑的研究框架,提高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应,使研究结论更具稳健性和普适性^[38]。

(二)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凉山州喜德县为案例研究对象,以喜德县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为案例样本。喜德

县是以农为主的深度贫困彝族地区、典型山区,被称为“彝族老家”。直至2016年前案例对象一直是以发展山地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但在国家农业现代化转型与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喜德县基于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大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形成以喜德阉鸡、花椒、百合、油橄榄、乌金猪等为代表的农特产品,并实施“三个带动”产业发展战略,以外来企业带动、本土企业带动、集体动员带动方式走出了一条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的“创新革命”道路。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联结本地农户增收致富,更带动了周边乃至省外村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持续转变。

在多案例研究所遵循的理论抽样原则和复制逻辑原则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了YH现代农业产业园、喜德县YY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Y”企业)与喜德县GK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K”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1)本次研究所选择的三家企业都是在喜德县发展特色农业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拥有相近的资源、环境、政策扶持等,有利于从这三家企业挖掘少数民族地区在区位条件限制下如何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带领农户发家致富的一般性规律,从而增加研究结论的推广性。(2)所选三家企业虽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都成了喜德县特色农业发展的示范性企业,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又能保证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应。(3)三家企业均是喜德县实施“三个带动”产业发展战略后,充分利用资源整合、多元参与和发展认同这三要素来谋取特色农业发展之路,最终收获成功,与本文的研究问题相契合。(4)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团队深入案例企业访谈和调研,对案例企业发展特色农业的相关情况有了完善的数据资料,为深入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三) 数据收集

为保证所收集信息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本研究通过深度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考察、档案材料等多元渠道收集数据,既三角验证多源数据,又丰富案例所需数据链^[39]。具体如下:(1)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对喜德县政府部门(如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等)领导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还对相关企业单位、机构等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共形成约6.6万字文本资料。(2)实地调研,赴案例企业现场进行实地走访并做好观察记录,形成文本资料1万余字,图片150余张。(3)档案资料,收集企业内部档案资料,如内刊资料、内部文件,以及一些外部资料,如新闻报道、研究报告等。具体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四)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遵循现有案例研究对质性资料处理的建议^[40],使用开放式编码处理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首先对原始资料进行归类排序,对分析整理过的原始资料进行一阶编码,即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通过文献指引,找出特色农业发展与理论维度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概念化编码,形成二级条目。然后对三个理论维度的资料证据对比分析,提取关键信息,并归纳总结这些关键因素的特点以及不同的组合方式,并对二级编码进行聚合,形成聚合概念,即多元参与、资源整合、发展认同。具体定性资料编码示例如表2所示。

对案例数据的分析步骤如下:(1)案例内分析,在单个案例分析过程中反复比较不断涌现出来的构想与现有理论之间的适配度,充分识别单个案例中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构想、关系,挖掘每个案例对

表1 数据来源统计

信息类型		采访对象人次	数据量统计
一手资料	半结构化访谈 (A1-7)	政府部门:宣传部、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共6人次)	时长约6小时, 文本资料约3.75万字
		其他部门:县农商银行、企业、产业园、农户(共8人次)	时长约5小时, 文本资料约2.82万字
	实地现场参观 (B1-5)	企业技术中心、原料采购中心、研发中心 产业园区生产基地、农户家中(8处)	150余张图片, 记录文本资料1万余字
二手资料	官方新闻资讯、视频(C1)	官方媒体对喜德县农业发展的有关报道	125条相关报道
	企业刊物、网站(D1)	公司简介、发展历程、产品介绍、研究成果等	8本刊物、16篇网页报道
	其他(E1-2)	统计年鉴、发展规划等	2本刊物

(注:作者实地调研与访问资料整理所得)

表2 定性资料的编码示例

聚合构想	二阶主题	资料证据(示例)
多元参与	家支集体	“我们园区涉及有32个彝族家支,483户农户,所有农户都有分红,这个园区把贫困户都带动起来了,还解决了当地的就业”
	内部合作	“我们给他们发猪苗、鸡苗,包括分红,农产品销售出去给他们分一部分,对这些贫困户进行帮扶,这些贡献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内外联结	“我们用心做好企业,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这里面也包括村集体和合作社,让他们发展村集体,集体经济让他们有收入,让大家都关心我们这个企业,关心我们基地的收益”
资源整合	资源集中	“国家扶贫政策给每个村发有不同程度集体经济发展资金,贫困村是给的50万,像我们这个非贫困村是15万,这样就把305万集中起来”
	资源传递	“央视帮扶我们这里,其实很多资源也跟着进来了,直播(带货)、网红(带货)这些措施都很直接”
	资源互补	“政府、外地客商和其他单位需要采购的时候,就会把电商协会的所有成员一起列进去,组织县上的产品一起销售,激发他们对这个平台带动致富的热情”
发展认同	文化认同	“陈总就是一个大德古,他干了27年村支书,大家都比较信任他,然后我们县政府也觉得他确实比较那种(值得信赖)”
	身份认同	“我还在想项目把所有农户一起带动起来,带动他们挣更多的钱。我是村委书记,想让村上发展一些经济,挣点钱”
	地域认同	“人要是混着的话没有多少年了,我还想着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另外一个高度,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来的”

(注:作者实地调研与访问资料整理所得)

研究问题的答案,尝试建立初步理论模型。(2)跨案例分析,当模型初步涌现以后,遵循复制逻辑加入其他案例,验证并识别相似性或差异性,对初步理论模型进行补充与改善,形成更可靠的理论模型。(3)研究成员在研究主题、数据资料、理论依据之间反复穿梭,持续进行数据资料和研究结论的迭代,直至研究结论与模型趋于一致性收敛^[37]。既完善研究发现,又与现有理论、现实实际紧密联系,最终构建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新内源性发展模型。

四、案例分析与发现

本研究基于新内源性视角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喜德县特色农业发展模式以及其内在作用机理。通过新

内源性发展的资源整合、多元参与和发展认同三要素,归纳了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和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三种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并揭示了其构建的过程规律,具体分析如下。

(一) 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

YH现代农业产业园是由喜德县HM镇九个村集体、佛山市南海区XQ镇与四川省烟草公司三家单位产业发展资金统一调度,135户彝族家庭^①以土地流转入股方式集资筹建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与智慧农学研学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园区成为凉山州科技进彝区培训基地、喜德县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同时YH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HM镇农民夜校实训基地,总计为200余户贫困户提供了就近就业及技术培训机会。2021年园区集体经济实现为每户入股农户经营净收入2000余元、贫困农户分红收入3000余元,以稳定的集体经济分红有效带动和帮扶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政府采取“强村带弱村”“德古^②带家支”模式实现特色农业资源聚拢的YH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最大的特点在于聚集内外部资源投入(如资金、土地、设施设备)及大规模动员彝族农户参与建设。家支集体的自然组织领袖——“区域性德古”担任园区理事会会长,是园区运转的关键人物。他不仅需要根据下拨的行政资源与区域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园区发展方向,通过“市场型代办”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还代表彝族家支表达彝族人民的参与诉求,争取和维护彝族人民的权益。家支集体性及基于集体性基础上的动员能力对参与地区自治有着强烈的内生需求^[41],为实现村社集体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园区雇员通过“三会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对园区实行共同治理,家支集体通过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互联互通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分配方面,家支集体享有固定租金和农地经营分红的双重收益,家庭劳动力还可配置于非农经营增加收入,提升自我成长能力。而其他参股主体则依据各自资源优势参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并根据设定的收益分配规则获得相应的收益。外部主体虽然参与园区投资建设,但是并不参与园区利益分配。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认为地方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产业发展,不仅能够通过参与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也能够充分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24]。

综上,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是在政府引导动员下将民族地区资源要素集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充分利用“区域性德古”关系纽带将多方参与主体形成的互助机制巧妙融入市场经济活动的模式。国家无法直接面对分散分化的少数民族民众,只有将原子化的民众组织集中建立相应的平台,才能集中各个领域资源“聚指成拳”,凝聚合力完成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布局。在政府有序引导组织下的少数民族民众广泛动员势必带来民族文化认同的高涨,民族文化认同的高涨也就有可能改变民族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态,减少客观相对贫困发生^[42]。进一步加快资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技术创新等领域布局或更好地向国计民生重点领域集中,实现资本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换挡加速”,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泛而不精”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该模型如图1所示。

(二) 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

YY企业是于2013年成立的一家本土综合示范性企业,同时也是喜德县首家通过电商网络平台助力特色农业快速成长的电商示范企业、本土龙头企业。YY企业在政府大力政策扶持下,搭建起本土首家电商网络平台并配备成熟电商运营团队,为全县农特产品营销打下坚实基础,并在特色农业品牌孵化、电商扶贫带头人培育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YY企业与地区内其他经营主体、农户等签订合同订单,以电商平台为枢纽进行内外部资源双向运输和传递。2020年YY企业实现1.68亿元电商平台交易总额,其中本地特

色农副产品交易总额9 970万元,以电商聚合效应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上行,带动农户致富增收。

在国家电子商务项目下乡战略支持下,YY企业依托电商网络平台将地区农特产品变成商品向外部市场输送,将地区资源转化为经营收入。作为“土生土长”的龙头企业,YY企业与内部各农业主体签订“农资供应—生产—购销—分红”一体化订单合同,通过定向(生产农资、技术支持与培训)融资或非定向(预付款/定金)融资方式支持地区特色农业生产。YY企业充分利用电商网络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产业链条带来的外部资源,解决在资金、技术、运输、防疫等方面难题,并在物资配送、技术服务、风险保障等领域将获取资源信息与技术服务向地区内部系统传递。而在与各内部主体签订的一体化订单合同中,生产要素“低进高出”产生的增值溢价,使各内部主体更愿意将产品上行来抵御市场风险。政府为鼓励各内部农业主体间通过合同、合作、合股等建立多层次、差异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少数民族地区分散小农以股权等形式将土地经营承包权与其他经营主体联结,以合作组织为单位与本土龙头企业合作,同时也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也可以个人为单位与本土企业进行业务往来,农户通过直接参与或借助合作组织的力量与本土企业进行联合与博弈,增强对企业的约束同时也监督其对自身的利益返还。

在民族地区密集的经济网、公共事务网、文化活动网中,YY企业借助电商网络平台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进入广阔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便利,方便地区民众在更大的社会网络中实施合作、相互学习和交流,带动了贫困户技能提升、就业、增收,凭借电商聚合效应形成“自我造血”能力,带来惠及所有参与者的“多赢”格局。“政府、外地客商和其他单位需要采购的时候,就会把电商协会的所有成员一起列进去,组织线上的产品一起销售,激发他们对这个平台带动致富的热情(A2)”本土龙头企业的利益让渡及产业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内部参与主体对政府领导的认可、本土企业的信任、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信心,这些力量将持续转化为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

综上,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是本土企业基于地区内部各主体对其身份认同基础上,发挥“火车头”作用联动其他农业主体,以订单合同为纽带、以电商网络平台为载体传递内外资源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本土企业在解读市场环境、挖掘市场需求、局部优化供求关系的同时自发地兼顾了脱贫致富的社会价值,一方面谋取利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让渡部分利益,维护地区内部系统间社会关系。电商网络平台嫁接了生产、消费、流通等环节资源,增强了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高效互动与资源信息的准确传输,促进联结机制向产业链、价值链层面延展,对于激发内部主体反贫困动力、树立反贫困信心意义重大,且对其他生计资本类型具有间接的拉动作用。随着电子商务网络的不断发展和规范,内部合作推进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化将会成为未来的趋势之一。该模式如图2所示。

(三) 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

GK企业是喜德县政府引进专业从事花椒产业化发展的民营龙头企业,目前是县、州龙头企业,州内行业领军,省脱贫攻坚协会副会长单位。GK企业推行农户土地入股、标准种植“五统一”等方式,开发了7 000余亩花椒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5个乡镇2 000余户当地农户(其中建档立卡户465户)共同开垦种植花椒,并与四川大学、省林草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研发20多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把“彝人老家”做成大凉山本土品牌、民族品牌,将“彝人制造”带出大凉山深处推向全国各地。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因独特语言与文化水平使其对接现代化农业组织成本很高,但其拥有产业发展需要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外来企业拥有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但与农户对接存在先天不足,

难以获得认同与信任,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面临阻碍。于是政府通过政策引领、组织劝说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小农散户等地区内部主体将林地、房屋及设施大棚等资源,通过转让、租赁、入股、合作经营方式参与到产业化规模化进程中,扫除GK企业在引进初期面临的发展障碍;同时组织GK企业与内部主体建立生产基地,推行产业联营,将区域内有限资产和资源融合互补。GK企业充分发挥自身在加工、流通和对接消费市场方面的后端资源优势,向前辐射各生产端主体,同时提供稳定性岗位吸纳高素质劳动力返乡就业以及为劳动力市场边缘群体提供灵活性就业岗位,保留地区人力资本,增强地区发展动力。农户获得资源流转带来多重收入的同时还能通过参与企业运营获取兼业收益。学习能力强的劳动者还可得益于外来企业的先进文化、先进理念提升自身素质,实现向企业管理层或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新内源式发展具体到个人维度的经济层面表现为兼业,外来企业可以提供给本地劳动力更多根植于本土的、形式多样的从业方式,且这种职业选择权在于农民而不是政府或企业。

为减少外来企业形成的“遮蔽效应”,政府鼓励地区内部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指导、就业服务等措施吸纳分散农户参与自身发展,凝聚合力抗衡外来企业,避免形成行业垄断。近年来,外来企业放弃直接捐钱捐物的“输血式”帮扶,而是义无反顾将产业线扎根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充分发挥自身实力和行业特点去“啃最难啃的硬骨头”,实现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这是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理念框架下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地域认同。民营资本反哺少数民族地区,是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下对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新实践形态^[43]。

综上,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是外来企业与内部主体在基于地域发展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政府搭建的“桥梁”将多方资源相互传递、动态互补形成的内外联合模式。政府常以优惠策略吸引外来企业参与本地区产业发展,并以特色项目为载体凝聚多元参与力量,用行政手段动员基层来维系产业发展秩序和经济发展目标。外来企业的资本化运作方式一方面能够充分挖掘地区被闲置或利用率较低的自然、人力等资源,把产业优势和企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势能,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与本地资源能够有效结合与释放,使地区经营主体在产业链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提升内生发展的动力与尊严。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将内部系统与外界社会之间的零散资源有效集中,互补资源整合优化,形成了多赢的发展格局。该模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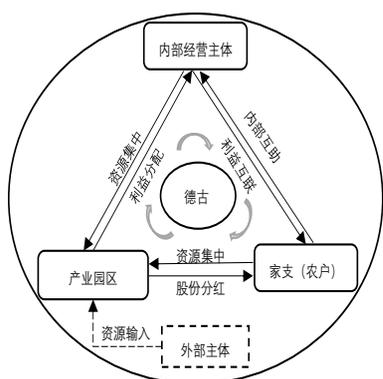


图1 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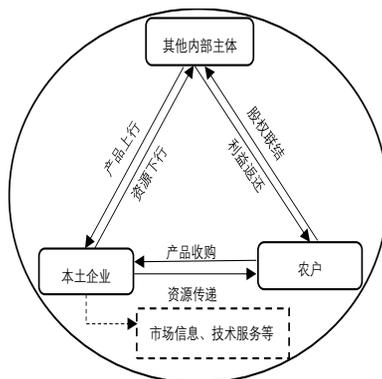


图2 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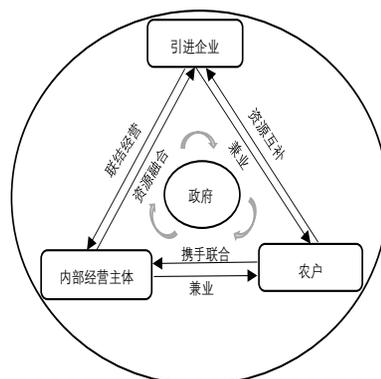


图3 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

五、结语

(一)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新内源性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的研究问题展开,基于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的原则,选取喜德县内3家特色农业发展示范性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新内源性发展机理模型(如图4所示)。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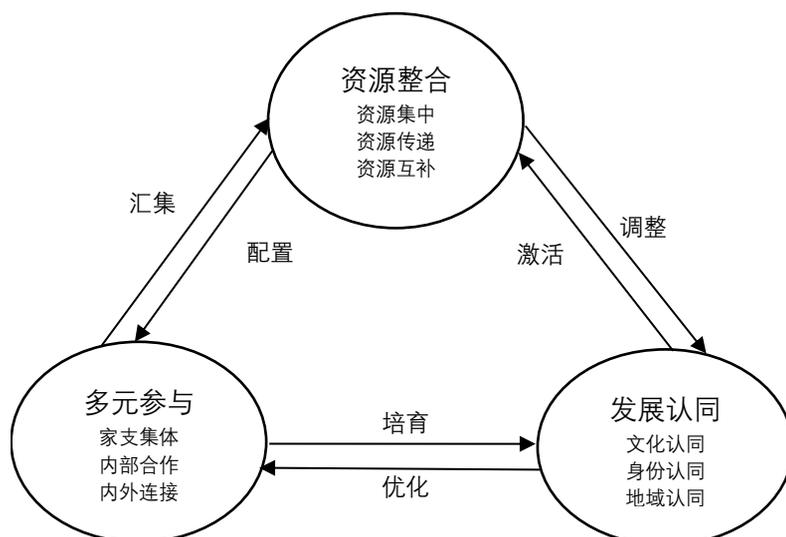


图4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机理模型

第一,多元参与、资源整合和发展认同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的核心要素。首先,多元参与是特色农业产业运转的引擎。但参与主体不同,产业模式也各异: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以农户——“家支集体”为主要参与主体,并且利用家支领导人“德古”作为多元主体间关系纽带,维护和引导园区主体凝聚的产业力量;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以内部经营主体为主,利用“以大带小”“以点带面”发挥本地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以外来企业为主,内部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下自愿参与,形成“以外带内”的主体参与模式。其次,资源整合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石,也是发展主体所驱动的对象,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实现内生驱动要素整合地区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新资源组合方式:集体动员型模式中外界社会提供财力资源修建产业园区,地区内部将零散的家支集体所拥有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集中全力投入园区运转;内部合作型模式中电商平台将内外环境中的市场需求、产品生产、物流信息等资源进行双向传递,当然在地区内部向外传递资源过程中,本地龙头企业发挥主要作用;内外结对型模式中外部主体将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带到地区内部,与地区内部的产业基础进行资源融合,将二者的资源优势互补,增强了资源的利用率。最后,认同激发多元参与主体对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动力,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集体动员型是所有家支集体基于自身民族文化认同,集中力量办大事;内部合作型发展模式则是本地龙头企业基于地区的归属认同、身份认同,以头雁身份带动群雁齐飞;内外结对型则是对国家整体脱贫、贫困地区整体发展的战略认同,用自身实力去建设地区内部。

第二,多元参与、资源整合和发展认同三要素之间交互作用构建了集体动员型发展模式、内部合作

型发展模式和内外结对型发展模式。三要素之间交互作用及其机制具体表现为：首先，多元参与促进了多样化资源的汇集，为资源整合提供了基础；资源整合为多元主体实施行为时进行了灵活的资源配置，为参与主体提供了资源保障。其次，多元主体的参与为实现发展认同发挥了培育作用，促进主体间在发展理念、管理模式等的一致性；发展认同为多元主体的构成发挥了优化作用，通过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使得参与主体更为聚焦且具有一致性目标。最后，发展认同对资源整合发挥了激活作用，为组织实施目标提供了更为对标的有效资源，资源整合过程中多元资源的融合过程对发展认同发挥了调整的作用，能够促使参与主体更快、更多元地发展认同。可见，基于新内源性发展视角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构建过程中，多元参与资源整合通过汇集机制与配置机制实现交互、多元参与发展认同通过培育机制和优化机制实现交互、发展认同和资源整合通过激活机制与调整机制实现交互。

（二）研究贡献与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将资源整合、多元参与、身份认同三要素联合起来考察其联动作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只考虑单一要素对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理论缺口，从理论层面对特色农业发展影响因素和模型进行了有益补充。（2）本文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探索出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三模式，并揭示了新内源性发展的三要素——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以及发展认同三者间交互过程与作用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将新内源性发展影响要素作为静态研究的不足。（3）本文响应了亨利·明茨伯格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回归到以内生式发展为主的路线上来这一观点^[44]，同时指出了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由发展地区内部参与和推动来促进地区发展^[45]，拓展并延伸了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研究边界。

本文的实践启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资源要素组合方式。地方建设要充分利用地区特色资源禀赋优势和资源链接能力，优化地区的资源要素组合方式，弥补内部资金匮乏、经营能力有限的短板，实现内外联动“1+1>2”的良好效果。（2）加快新型农户经营主体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内生发展必须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强化民族地区发展认同。产业发展不可忽视民族地区传统民居和聚落空间所承载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内部经营主体更应该将文化身份投射到外部环境，即将民族文化属性纳入企业品牌，在更广泛的贸易和政策环境中建立和提高其知名度。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本文仅选择凉山喜德县一地进行研究，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众多，点状分布广，山地农业与高原农业、丘陵农业等其他地区农业发展有所不同，不排除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不同的特色农业新内源性发展模型的可能性，未来可通过增加更多其他类型的案例进行逐项复制或差别复制，以获得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其次，本文重新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相关解构，未来还可以考虑纳入其他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因素，促进特色农业理论创新。最后，本文选择了三家特色农业示范性企业进行多案例分析，但在不同的时间发展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未来可引入时间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以提高研究的深度。

注释:

- ①家支即家族支系,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形式,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
- ②德古是指黑彝家支内部通过选举产生或任命的领导人物,他们阅历深、见识广,善于辞令,能排解重大的家支纠纷,不仅在本家支,甚至在其他家支中都享有崇高威望的人被称为"区域性德古"。

参考文献:

- [1] 郭景福,田宇.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减贫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对策[J].中南民族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40):144-148.
- [2] 张兆忠,李明轩.新时代民族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17-124.
- [3] 潘泽江,张焰翔.民族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影响因素与培育策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5):133-139.
- [4] 周运兰,周琴,罗玉霞.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9-126.
- [5] 任海军,郭子焯.丝绸之路经济带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遴选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5):120-127.
- [6] 黎杰松,李键江.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学术交流,2021(9):96-109.
- [7] 王丰.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第二次飞跃"的逻辑必然及实践模式[J].经济学家,2018(3):82-88.
- [8] 胡鹏,李忠斌.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战略思考—基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J].农业经济,2018(12):9-11.
- [9] 李晋,戴旭宏.脱贫摘帽后原深贫山区乡村的经济韧性建构—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为例[J].农村经济,2021(11):45-52.
- [10] 钟君.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研究—基于国内文献综述的讨论[J].改革与战略,2016(2):67-71.
- [11] 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5):47-51.
- [12] 蔡军.民族地区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研究—以攀西地区优势特色农业资源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0(06):121-125.
- [13] 公茂刚,辛青华,王学真.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内生发展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0(5):126-135.
- [14] 田逸飘.武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及其减贫效应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8.
- [15] 杨志龙,陈卫强.特色农业产业成长的逻辑理路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6):12-19.
- [16] 李金锴,陈珏颖,冯祎宇等.中国特色农业智库建设要求、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J].世界农业,2019(10):13-17+39+130.
- [17] 刘博敏,戴嵘,杜建军.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3,39(1):92-96.
- [18] 陈银娥,汤广清.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化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115-127.
- [19] 李静,陈亚坤.农业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22(8):52-69.
- [20] 闫宇,汪江华,张玉坤.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与拓展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19-23.
- [21] 张文明.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J].探索与争鸣,2012(11):14-16.
- [22] 李怀瑞,邓国胜.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21(5):15-22.
- [23] 马荟,庞欣,奚云霄,等.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3):28-41.
- [24] 张文明,章志敏.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2018(11):75-85.
- [25] 江剑平,葛晨晓,朱雪纯.新时代以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为核心的乡村振兴逻辑[J].财经科学,2020(9):50-63.
- [26] 闫彩霞.后乡土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路径—基于内生发展的分析视角[J].兰州学刊,2019(4):173-183.
- [27] 徐虹,张行发.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内在逻辑、多重困境与实践探索[J].现代经济探讨,2022(1):114-123.
- [28] 黄金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瓶颈:投资不足[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9.
- [29] SCHULTZ T 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Reply[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6(4):1015-1018.
- [30] 张笑寒,汤晓倩.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参与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研究—基于政府激励视角[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187-198.

- [31] 孟庆渡.项目进村、村社自主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162-170.
- [32] 田逸飘,张卫国.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村410个样本农户的调研分析[J].西部论坛,2018(1):46-54.
- [33] 薛海波,吴文良,渠鲲飞.特色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发展的实证分析与优化建议——以沂蒙山区桃业与旅游业为例[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4):85-94.
- [34] 田逸飘,张卫国.能力差异视角下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减贫效应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4):71-79.
- [35] 汤法远,马博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4):27-32.
- [36]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8.
- [37] EISENHARDT K M,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1):25-32.
- [38] 毛基业,李亮.管理学质性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南开管理评论,2018(6):12-16.
- [39] EISENHARDT K M.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4):532-550.
- [40] MILES M B, HUBERMAN A M.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4.
- [41] 郝彧.凉山彝族家支的权力结构与彝区乡村秩序控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43-47.
- [42] 胡凌啸,周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对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评估[J].农村经济,2021(11):1-9.
- [43] 陆继霞.中国扶贫新实践: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与内涵[J].贵州社会科学,2020(3):154-160.
- [44] MINTZBERG H.Developing Leaders? Developing Countries?[J].Development in Practice,2006(1):4-14.
- [45] 邓万春.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J].理论月刊,2011(4):44-46.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Its Mechanism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Xide County

XUE Min, PU Hailian, YANG Yilan

Abstract: Promoting advantageous an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xploring e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models is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in Xide County as a case sample, and uses multi-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influenced by the three factor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identit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factors has formed thre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inter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l-external pairing.

Keywords: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thnic minority areas;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